

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 / 唐磊主编.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 - 7 - 5086 - 1324 - 6

I. 三… II. 唐… III. 经济 - 研究 - 中国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2413 号

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

SANSHINIAN SANSHIREN ZHI JIYANG WENZI

主 编 : 唐 磊

策 划 者 :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经 销 者 :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5.75 字 数 : 211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86 - 1324 - 6/F · 1455

定 价 : 36.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 - 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 010 - 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谨以此书献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院三十周年

特别鸣谢高士社科公益基金（筹）

目 录

缘 起 V

徐友渔：为着启蒙艰难前行 / 1

周国平：生命的价值与追寻 / 15

苏国勋：通过韦伯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 / 31

何光沪：此心安处是何乡 / 53

钱满素：美国文明研究的自由视野 / 73

高全喜：寻找通往大国的政制之道 / 89

刘东：理论之上的心智 / 105

王逸舟：中国只有改变自身才能影响世界 / 121

于沛：历史的民族记忆与世界史观 / 137

陈力丹：新闻学的“拨乱反正” / 151

汪晖：对现代中国思想的整体反思 / 167

陈晓明：回眸三十年来文坛 / 187

渠敬东：失范社会与道德秩序的重建 / 203

陈明：当代中国的儒者之维 / 217

许宏：发掘最早的“中国” / 231

缘起

——生活就是路径

北京、朝阳、四元桥外：西八间房。

在一座占地不到四十亩的院落，进出其间的人一半以上都戴着眼镜，就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培养出了六十余位在职的副部级以上干部，知名学者和企业家更不胜枚举，这里就是代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在地。

2007年底的一天，我们偶然聊起母校即将迎来的建院三十周年，便发心为母校尽些微薄之力，思来想去，决定做一本校友访谈录作为献礼。

三环路、红领巾桥、东郊的咖啡馆：普洱茶一壶。

在学校院庆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编委会”在此成立，滕征辉师兄牵头做了编委会主任，喻建欢总责其事，昔日一干球友唐磊、汤铎铎、刘江等人纷纷前来助阵，各自负责具体工作，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魏志强师兄被专门邀请助拳谋划。

北四环、亚运村、湘西的土菜馆：大碗盛酒。

一干师兄弟围坐一桌，纵忆研院往事和校友风采。经济所张平师兄对经济界的掌故如数家珍：从许涤新、孙冶方、薛暮桥等八位部长驾临经济所，到巫宝三、顾准、刘国光、张卓元、吴敬琏等大学者济济一堂，当年国内经济学翘楚唯我社科院经济诸所。

酒入酣时，各抒己见，大伙回想改革之初，社科研院的莘莘学子生逢其时，他们年轻没有框框，师从社科院各所身在第一线的研究老师，参与当前的改革实践，接触吸收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练得一身硬功夫，行走在改革的最前端。1979年，以“改革四君子”中社科研院78级学生黄江南等为核心，他们自组“青年经济论坛”，亲历“老青对话”。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话如在耳边：“这是建国以来中央第一次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讲经济”。随后，82级的华生、张少杰等人又在莫干山以“价格双轨”一战成名。从此，奠定了社科院学子投身改革的传统。

酒过三巡，渐入佳境，《三十年三十人》最后确定为两本书：《指点江山——经济改革卷》、《激扬文字——思想社会卷》。

十里河、八间房公司、无茶无酒：一摞文稿。

捧读三十人的采访，众编委都兴奋地介绍着自己的收获：“改革四君子”的黄江南会告诉你经济改革实践的缘起；“京城四少”的樊纲会将我国成功转轨的经验娓娓道来；喜欢看未来的冯仑会滔滔不绝地讲民营企业的前世今生；低调的张德霖会平静地向你复述“国企改革的现实逻辑”；偏爱“走那条窄路”的郑秉文会帮你梳理我国社保改革的历史脉络；而听张少杰和华生回顾“价格双轨制”的历史意义，你又会感受到当事人那种“我们都太想改变这个世界了”的理想主义情怀。思想界，更是异彩纷呈：我们可以从启蒙、法治、新闻、教育、学术、文学等多个领域了解三十年思想界的来龙去脉，听名家演绎从美国文明、欧陆思想到史前文化的精髓。

在诸多出版社中，编委会与中信出版社的《比较》编辑室最为投缘。肖梦主编本身就曾是社科院财贸所的老师，带着一水儿的女将，对我社科学界耳熟能详，给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大量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没有她们，就不会有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本书。

如今，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似乎不可避免。在各种关切的目光注视下，我们又看到了研究生院毕业生们那些熟悉而活跃的身影。中国将如何从这场危机中重新走向繁荣，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身影是我们中国人的脊梁，挺起了脊梁，就托起了希望。

三十功名尘与土，万里山河云和月。三十年，说长不长，但对人的一生来说，绝不算短。

三十段采访对话，惊现改革三十年三十组现实注脚，三十个人生故事，浓缩三十年改革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他们自己的人生诠释三十年的沧海桑田，求解自我的存在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就是路径。

再次感谢三十位接受采访的校友们。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

《八间房丛书》编委会

2008年10月

徐友渔： 为着启蒙艰难前行

二百年多前康德对“启蒙”的解说今天仍言犹在耳：“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用徐友渔的话来说：“启蒙就是解放思想，冲破愚昧和迷信认识；启蒙的对象是无知者或无勇者；凡先觉悟者，即可启蒙后觉悟或不觉悟者，哪怕先后是暂时的，贤愚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方面对你启蒙，你也可以在那方面对我启蒙。”

改革之初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可以视为一次全民族重新接受启蒙洗礼的活动，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权力运行与个人崇拜的结合会给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但是，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民族来说，摆脱蒙昧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即使在日新月异的三十年大发展中，我们还会不时看到身边形形色色的非理性群态。自晚清、“五四”以降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开拓的启蒙活动，直至今日仍未完成其历史使命。也许，面对人性中永远无法驱除的卑微和冥顽，启蒙精神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前进动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徐友渔三十年来的思想道路和学术活动都可以视为围绕启蒙这一主题展开，尽管这条路注定充满了险阻。



徐友渔小传

徐友渔，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77届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为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等院校访问学者，2001~2002年为斯德哥尔摩大学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

长期研究语言哲学，从20世纪末开始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是国内自由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也是国内反思和研究“文革”的重要学者。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等。

中国人应该学会尊重经验事实和逻辑，不能靠激情、冲动和乌托邦理想行动

问：徐老师，让我们从您 1979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开始聊吧。我注意到您的硕士导师是徐崇温先生，徐先生主攻领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您最初的学术方向是英美分析哲学，这两者似乎大相径庭。

答：这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1979 年，当我从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考社科院研究生时，本来打算考数理逻辑的研究生，但那年社科院不招数理逻辑的研究生，我只好报了接近的专业，即英美分析哲学。招我入学的导师是杜任之，这位老先生是位老革命家，他的兴趣是德国哲学，特别是尼采，当时年纪也比较大了。但他很负责，要写论文时他决定在行政上由徐崇温先生当我的导师，负责我的学业，他知道我希望学习分析哲学，就请北京大学的洪谦教授在专业上指导我。每周我都要去北大见洪先生，包括硕士论文也是在洪先生指导下完成的，论文题目也是他定的。杜任之老先生虽然没有成为我实际的导师，但他独有的胸怀和人格魅力一直让我感动，没有他的帮助，很难想象我能走上分析哲学的学术之路。

问：您报考研究生时选择分析哲学为主攻方向，是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吗？

答：不全是。经过“文革”，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反思，都希望中国能有所改变，自己能有所贡献。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我考虑过报考于光远的，因为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思想学术界很重要的一个人，当他的学生，毕业后可能在变革现实方面有一些有利条件，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方面我跟别人思路不太一样，许多人有抱负，也许理想也很纯净，但往往想法很直接。比方考虑到中国贫困、被人欺凌，需要发展经济，于是就去学经济学；或者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改革就力图去从政。而我自己习惯在思想层次进行考虑。

经过“文革”，我个人最大的反思在于：在中国这么一个文明古国，在“文革”中，大家（包括读了很多书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表现得那么盲从、那么简单、那么激进？

往深一层思考，中国人的价值观有时会出现问题，比如把“三权分立”、

“议会民主”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认为他们的民主、人道主义都是虚伪的。还有集体的那种大轰大嗡的情绪也时有出现，一人呼号，应者云集。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改变。日前有些抵制活动就是这类性质的。

当我选择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已经超过三十岁，而且经过对“文革”的反思，对中国人价值观等方面的不足有很深的体会，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想法：中国的现代化除了需要经济、政治、制度或生产管理等方面改变以外，最根本的可能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理解以及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精神气质方面需要进步。我觉得借鉴分析哲学可能是一种进路，因为分析哲学一方面要靠逻辑，另一方面要靠经验，这两项正是中国人最欠缺的。中国人应该学会尊重经验事实和逻辑，学会讲道理，不能靠激情、冲动和乌托邦理想来行动。

后来我的研究兴趣有所扩展，比如做过“文革”史的研究，现在做西方当代政治哲学。但是最初的那个信念至今没有改变，一以贯之，就是要借鉴西方，吸取我们思想文化传统欠缺的价值和改变思维方式。

问：我理解您这个信念就是致力于“启蒙”，帮助大众祛除蒙昧思想。

答：最初感觉我们的社会需要在思想上有重大的改变，后来这种感觉逐渐清晰，思考什么是文明，如何走向文明。一开始也并没有那么自觉地做启蒙的工作，不过这么多年所致力的工作确实有一条线贯穿着，你要用“启蒙”来总结的话，我觉得大体也是合适的。但这个“启蒙”并不是从严格意义的学术上理解的，而是基于“文革”后对中国状况的体验和反思，希望中国摆脱蒙昧，走上理性之路。

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质上是向常识的回归

问：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可以视为全面改革的起点，是否可以当成新时期一次重要的“启蒙”活动？

答：在一个并非绝对根本的意义上，可以这样说。首先，我完全同意你们所说，并且确实可以观察到，1978年那次“思想解放大讨论”给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从这种意义上我觉得说它是一场“启蒙运动”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确实处于蒙昧的状态。典型的例子就是“两个

凡是”。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应算是一次标准的启蒙，它打破了“凡是毛主席说的就是真理”这一条。

不过，我1979年来到北京，发现有一批“文革”中没有停止阅读和思考的朋友，在思想上已经超前于那个时代。我们知道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起因和有效范围是在实际政治方面，而不是在纯粹学术理论方面。虽然一方面这场大讨论相对于“文革”状态是有决定性、革命性的一个突破——如果没有1978年的那场运动，中国后面的任何进步可能都不会发生，以那场运动之艰难、过程之曲折，对其在中国当代史上的功勋再怎么也许都不为过，但是，我们根据自己对西方哲学的理解，认为它实质上是向常识的回归，是很普通的事情。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给予这次“思想解放”的“启蒙”活动很高的评价，但从绝对意义上评价，它在思想或学理上还不是崭新的东西。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承认一加一等于二了，这对于以前不承认的时候意义很大，但如果另外一个坐标是人类文明，与文艺复兴那样真正的启蒙相比，这样的事就很难说在人类文明上添加了多少彪炳史册的东西了。

问：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今天，三十年中有过多次思想运动或者某种文化思潮的起伏，有多少在严格意义上是符合“启蒙”方向的呢？

答：如果不是非要拿人类文明的尺度去量，而是用一个相对的尺度和中国的语境去看，许多文化活动和思想运动都是很有意义的。但你们提到“启蒙的方向”，我觉得要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评论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那样，使“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1978年到80年代末这十年中，给人的感觉就是有跟真正的启蒙很相似的东西，经常能使人联想起恩格斯这句话。

下一个具有这个方向意味的运动，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当时我们这批人已经较早走上社会文化舞台，开始发挥作用了。那时候对文化的尊重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与今天我们拥有如此多元的文化、多元的娱乐享受相比，那个时候大家唯一想的、可以做的就是看书，现在很难想象那种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学者和一个文化人，是非常怀念80年代中期那种“文化热”的。

我举几个例子。当时最早主动在这场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是以汤一介先生为首的“中国文化书院”。他们在全国办学习班，谈文化传统、中西文化比较等等，可以吸引几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参加，那是很严肃的知识普及和学理讨论，这在今天有点不可思议。还有《走向未来》丛书，发行量非常大。我们也办了学习班，讲当代最新的人文思潮。有一个学员是某大学的教授，通六国语言，但他自己很真诚地从外地自费来北京学习。当时就是那样，大家都如饥似渴、不顾一切的追求新知，而且有一种自觉的思想文化使命感。大家都感觉自己身处一个变革的、欣欣向荣的伟大时代，感觉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跟这个社会潮流在一起的，充满了光荣与梦想。而在那以后，这种感受就比较少了，当然希望还是有的。

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文化的发展

问：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入，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到今天，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如果用那句古语“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作为常理逻辑，是不是可以认为，经济水平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也自然提高，或者说，启蒙实际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呢？

答：以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许刚好相反。更准确地说，不是截然相反，而应该说启蒙要面对一个复杂得多的环境。

1992年以后，下海经商流行起来，大家都争着去发财，然后从1994年开始，《读书》就推出“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普遍感觉人文精神失落，道德水准、艺术水准和美学感受都江河日下。这里我不愿意从整体上加以否定，说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后，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准反而降低了，从情感上不愿意给出这样的判断。但我们周遭的事实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两点：首先，个人的发财致富如果不在一个社会公正的框架内进行，就会激发人们恶的一面，也就是说，你不讲道理、不讲良心反而有可能发财；另一方面，金钱越来越成为衡量社会价值的很重要的尺度，于是我刚才怀着深情叙述的80年代文化热的黄金时代不复存在，文化生产也很少出现高雅的、带思想性的东西，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企业式的文化生产、批量生产开始出现并很快发达起来，文化的大众化和低俗化趋向越来越明显。从实际经验上，道德可能相对于经济发生逆向运动。

你们提到的这种观点，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李泽厚先生，他提出过“吃饭哲学”，认为首先要解决生存的问题，民主、文明之类的问题最后解决。曾经在大饥荒的时候，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那是最不道德的，但是如果那时每家每月多几十斤米，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仓廩实而知礼节”是完全成立的。但由于中国处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仓廩实而知礼节”的效用在短期内很难见到，大家在道德上更多的是彷徨、无所适从。

问：也就是说，您不单纯地相信整个社会的文明修养、一个民族整体的精神气质，是自然而然地随 GDP 的提高而增长。

答：是这样的。如果就这么放任自流的话，我可能要抱一个悲观的展望，而不可能有乐观的展望。

问：改革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际上，邓小平在 1983 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最近又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政治文明”，也是看到“仓廩实而知礼节”这一逻辑背后的实际矛盾。

答：严格从学理上讲，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文化的发展。当然某些具体情况会直接促进道德文化发展，比如刚才我举的例子，从饿殍满地发展到衣食无忧，人吃人这种最不道德的行为就会自然消失。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只是为道德文化发展开辟了道路和准备了某些重要的条件。可是如果别的东西比如制度、文化基础环境（社会对文化的尊重态度）很糟糕的话，准备条件的效用也可能不会发生。现在提“政治文明”是为了修补制度上的一些缺陷。最近余英时先生有一篇文章令我感慨很深，文章的题目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我们曾经破坏的东西，需要一点点修复和改变。我们对于这方面的认识，也不能归结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民族性问题，而应该看到更深刻的制度、法理等机制。

我的这种思维方式也许是我个人被划归的“自由主义学派”的基本主张有关。我们看问题努力向人类精神文明的最高点看齐，所以我们提出的社会理

想是最高、最艰难的，但也是最根本的。如果是实务家，我当然选择支持最现实的操作方式，但我要强调我们自己的学者立场，要坚持最根本的理念。

80年代“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本在同一个阵营里

问：您提到“自由主义学派”，我们都知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思想界逐渐出现分化，尤其是产生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化，两派都提出了学理上的主张，十几年来在思想界有过几次正面的交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您能简单描述一下两派的异同吗？

答：“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两派在20世纪80年代完全在同一个阵营里，没有什么区分。大家的思想和言论大方向是一致的，都声称自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启蒙”的传人，都要求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在90年代，“自由主义学派”的主张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坚持80年代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那些“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理念。但“新左派”就批评“自由主义学派”没有与时俱进，仍陶醉在80年代的话语中，提出现在的任务不再是简单的捍卫和继承，更要批评，他们对于现代化的取向从80年代的肯定、支持、争取变为90年代的批判、消解、否定。

“新左派”感觉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时代，简单地说就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中国有了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危险。这种认识或者说思想选择，刚好和西方的后现代、后殖民等西方新左派话语能够嫁接在一起。我有一篇文章叫《中国社会转型的两方面问题》，也谈到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但这里有一个主次轻重的判断。“新左派”认为中国在社会性质上已经进入资本主义，于是把他们所有的批判转向这个新问题。现实情况符合他们的分析吗，中国现在真的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了吗？我认为，要面对中国的现实，诊断中国的基本问题，需要现实感，同时也需要均衡感。不能忽视诸多问题间的数量比例和主次关系。中国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一种，有旧体制——斯大林模式的问题，也有市场经济出现后新的，类似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但是在目前阶段，前一种问题为主，后一种问题为次，而且后一种问题依靠前一种问题来起作用。

我坚决反对“政治儒学”的“文化保守主义”

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保守主义”也逐渐走到思想界的前台，发出许多声音，并且这些声音似乎越来越洪亮有力，您是怎么看待自由主义与它们之间的异同的呢？

答：如果说“新左派”跟“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是90年代基本的思想格局，到90年代后期，“文化保守主义”的加入便形成三足鼎立，这种格局代替了此前的二元对立。在这一点上，“新左派”对于“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家”这些思想流派缺乏正面和系统的看法。

在对待“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家”这方面，自由主义有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有天然的亲和力，代表者如刘军宁等。照刘军宁的解释，自由主义就是保守主义，他觉得两者应该是没有区别的东西。而自由主义从学理上来讲确实不喜欢那种激进的、革命的、大破大立的社会变革，所以刘军宁甚至把“保守主义”跟“自由主义”解释为一回事。这一部分的自由主义学者在鼓吹“文化保守主义”方面甚至比“文化保守主义者”做得更多、说得更雄辩。另一批学者如袁伟时等还是基于中国背景，从“德先生”、“赛先生”的角度、从坚持启蒙和现代化导向来理解“自由主义”。

总的来说，“自由主义学派”对“文化保守主义”有一份同情的理解。我自己出于同情心的理解也有。对此我有一个考虑，就是从实际而不是从教条出发，应该说，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大国，尽管传统里面有许多诸如“父父子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等荒谬的东西，但不能完全抛弃传统，对于传统的尊重还是要有的。

曾经我们通过行政手段把传统文化当成“封建文化”进行彻底批判和破坏。考虑到这种情况，当我面对国学或者文化传统大力复兴的时候，并不认为是一种坏事，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文化秩序的恢复，是一种补课。

这种恢复、补课我坚持在“文化儒学”的范围内，而不是像“政治儒学”所主张的那样，要恢复“君君臣臣”的皇权制度，“君子小人”的等级制度。它主张，现代民主制在中国行不通，普选制很糟糕，要承认天生贵族，说一人一票形式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大学教授和18岁的待业青年在道德、知识、

判断力各方面都不可能平等，要恢复传统的道统和传统的政治秩序（就是要讲等级制），这种“政治儒学”的“文化保守主义”，我是坚决反对的。

自由主义必须学会直面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问：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到2001年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较之以往更加深入、全面地介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同时，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它越来越受到关注，各方面的利益博弈也更为复杂，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逐渐增强，从1999年的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到不久前奥运火炬事件的国人反应都可以看出这一点。这方面，“自由主义”怎样看待“民族主义”？

答：“民族主义”包括“民族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它在新世纪之交勃兴，势头很强，甚至一下子就超过了文化保守主义。这之间的关系十分有意思。对于这一点，我愿意多说一些。

首先，自由主义从一个粗浅的维度，在一开始实际上跟民族主义有界限，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因为说到底，民族主义特别强调不同文化间有差别的、相对立的那一面，而如果你老是强调文化相对主义，强调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就很可能得出自由、民主等普适价值不适合该国的结论，但自由主义恰恰强调的是普适价值。所以自由主义者对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激进非理性的“爱国”冲动总是持批评态度。

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某些自认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总认为应该拥抱自由、民主、科学、理性这些西方启蒙时代传下来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于起源于西方的价值是全盘认可的，但有些人陷入一种误区，即凡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西方国家的行为也总是对的。这样的话，当中国跟某个西方国家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也认为西方是对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坚持学习发源于西方的价值时，是否承认国家利益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说当中国跟西方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有地缘政治学的考虑，而不仅只想到立国的理想和价值？

进一步说，西方的立国原则、支撑它们的那种内在核心价值是一回事，但这些和它们某个具体的外交政策是不是一回事？我个人认为，西方的那套建国原则同其国家利益应有区分。比如美国的一些人就反对跟中国做生意，觉得是给中国提供就业机会，是剥夺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每个人、每个阶层都会有自己自私的考虑。所以，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地缘政治学、国家利益这些概念，但实际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包括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很缺乏这个概念。

和我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高全喜、李强等学者。实际上我们在“自由主义学派”中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中国也需要一种“理性爱国主义”，或者是自由主义思想支配下的一种“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跟那种泛滥的、起哄的、狭隘的、狂热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对立，我们除了拥抱普适价值外，也必须同时正视一个现实：作为一个国家，中国的国家利益跟西方国家会有冲突，这种冲突不是文明跟野蛮的冲突，不是民主与专制的冲突，而是国与国之间的现实利益冲突。

从这个角度上讲，自由主义者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继续启蒙的工作会有两条战线。一方面，自由主义必须跟那种无条件认同西方价值乃至西方国家行为的态度划清界限，学会直面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要回避它，要理性地支持正当的国家利益，合理地引导民众天然自发的民族情绪，这对于实现启蒙有很大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因为坚持国家利益一不小心就容易滑向国家主义。所以，我很强调学者要有均衡感。

问：一个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必须保持开放性，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也应当对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丰富的社会现实和不断涌现的各种理论主张进行回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多种“主义”，如生态主义、社群主义、女性主义等等，都包含着政治上的平等诉求和文化上的多元主张，相应的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也开始流行，您能简单评述一下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吗？

答：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是西方最新的思潮，也给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带来许多新的内容。因为还在发展，而且有很多微妙之处，所以这里只能简单说说。文化相对主义立场是用一种文化特殊性来挑战和批判自由